

对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发展趋向的思考

胡 勇

[摘 要] 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新趋向必须在西方 2000 多年的民主理论发展史中去考察。这种新趋向和现代民主理论具有一定的断裂性,却和古典民主理论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关键词] 古典民主理论;现代民主理论;当代民主理论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9)05-0686-06

对于民主理论的研究与探索,在西方独特的历史氛围中已经延续了两千多年。在这样漫长的一段历史长河中,人们对民主理论的认知并没有保持同一的面貌。民主的核心涵义和根本价值没有发生改变,但对民主的外在表现与实现方式却出现了迥然不同的认知。从古代、现代,再到当代,民主的理论形态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

当代西方社会脱胎于现代西方社会,和它的母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由于当代西方的生产技术、社会生活与道德观念同其现代相比,具有了一定的断裂性,这种断裂性自然会影响到人们对民主的理解与认识。为了更准确地认识当代民主理论的这种新趋势的具体面相,更恰当地评价这种新趋向的特定意义,有必要对西方民主理论的形态进行一番历史特性的考察。

一、古典时期的西方民主理论

古典民主理论作为人类民主观念的滥觞,为后世留下了深刻动人的灵感。古典民主理论以古代雅典和古代罗马为其关照对象,其生存的独特社会经济体制——奴隶制和独特的政治环境——城邦(或城市国家),造就了其特有的对于民主政治的认知与体验。古典民主理论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一)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

古代世界中奴隶制的存在可以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以谋取生计为中心的一系列生活琐事,专心致志地从事文化与政治等高雅活动;城邦生活的简化可以使政治摆脱现代专业分工的铁律,芸芸大众都可以参与政治决策。这样,政治就有条件成为公民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为古典思想家将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论断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简单的经济生活和全能的城邦政治导致生活条件的改善取决于政治生活的参与,政治成为生存的基本手段。政治不是公民生活的边缘性事务,而是公民生活的中心事务,甚至成为作为人的一种本质规定性^{①[1]}(第 9 页)。这样就为古典思想家将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论断提供了一种必要性。生活化的民主观念在古典政治生活中意味着:公民的日常生活和政治息息相关,民主既是一种政治体制与程序,也是一种日常生活方式;政治成为横亘于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事务,公生活与私生活之间可以相互沟通与转化。这种民主观念也会导致政治的全能性和渗透性以及私人生活的政治化。

(二)以伦理诉求为目标的民主

古典民主脱胎于公民日常生活,但古典思想家却将超越物质利益索取的伦理诉求作为民主政治的

核心目标,将低俗生活上升为高尚生活。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人们参与民主政治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谋取优良的生活”^[1](第130页)。优良生活即实践美德或德性的生活。德性的生活即是将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这两种德性结合起来加以实践的生活^[2](第34页)。因此,在古典思想家看来,民主政治使得公民可以通过政治讨论、公职选举、担任公职和保卫城邦等一系列活动,获得丰富的治国知识与哲学智慧,养成高贵的道德品质,从而得到个性的发展与完善。古典民主理论以伦理诉求为目标,自然要求将民主作为一种完善个人品德、获得自我实现的手段,反对将民主作为维护个人安全或获取物质利益的工具。

(三)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民主

在古典时代,作为袖珍式共和国的城邦极易受到外部的征服,或发生内部的动乱,从而导致民主政治的颠覆。城邦的自治、民主的维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民的无私和忘我,特别归功于公民为了城邦的生存而自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和权利。这样就造就了古典民主理论的核心价值: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服从于公共利益。因此,古典民主理论的基础是公民的责任,而非公民的权利;古典民主理论提倡的是一种道德政治,而非利益政治。

(四)以品德为动力的民主

为了维护政治的公益性,为了巩固民主政治的生存基础,古典民主理论要求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与灌输,将特定价值观的教育作为基本国策。另外,就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古典民主论断而言,政治生活在人类一切活动中居于中心地位,政治参与高于其它一切个人活动。政治既然是人类的中心活动,就需要公民全心全意地投入,需要公民“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独立的人,而只看作共同体的一部分”^[3](第10页)。这样,在古典政治思想家看来,通过教育使公民抛弃自我,融入政治共同体,获得政治参与的美德——公民美德就成为攸关民主政治存亡与人类幸福的一件要务;由此我们理解到,为什么公民美德与政治教育成为他们关注的中心政治议题。所以,卢梭才会说出这样一句似乎非常突兀的话:“这本著作(即柏拉图的《理想国》——本文作者),并不像那些仅凭书名判断的人所想象的是一本讲政治的书籍;它是一篇最好的教育论文。”^[3](第110页)所以,颇有古典共和情怀和遗风的孟德斯鸠才会认为,民主政治需要品德作为“动力”,“共和政体是需要教育的全部力量的”;通过教育,激发公民的爱国心,“不断地把公共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4](第20,34页)。道德教育常常意味着对某种特定的价值观、特定的生活方式的强制灌输,因此,对道德教育的倡导与实施必然使得古典民主理论反对政治中立论和道德多元论。

(五)以直接参与为模式的民主

理想民主论者认为,民主意味着自治,最完善的民主意味着公民最彻底的自治,最彻底的自治则意味着公民亲自处理一切政治事物,而不需要他人作为代理或中介。所以,作为古典民主的真诚信仰者,卢梭才会认为,人民一旦选出自己的代表,他们也就失去了自己的自由^[5](第128页)。一切民主原教旨主义者之所以推崇古典民主,就是因为它的基本模式是直接民主制。在古典民主理论的视野中,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立法、轮流担任公职人员、亲自决定审判结果,是自己真正的主人。由于社会生活的单一化,政治生活的简单化,政治事务的崇高性,在古典思想家们看来,自己有能力行使的权利却要交给他人来代理,这是不可想象的。

(六)以平民主义(或平等主义)为特征的民主

古典民主理论强调政治参与主体的平等性,消除一切可能危害民主生活的特出人士和宗派集团。亚里士多德认为,为了维持平民主义政体,驱逐才德优胜人士的“陶片放逐律”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办法^[1](第155页)。维护民主的古典思想家们既要提防具有个人野心的阴谋家与煽动者,也要反对背离公共利益的宗派团体。因为这些人可能会颠覆民主政治,或者异化民主政治。因此,就这个意义而言,古典民主理论提倡一种一元主义政治,而非多元主义政治。

古典民主理论出现在经济生活落后、人口规模较小、社会生活简单而同质的古代城邦中,特定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状况决定了其上述的一系列特性。由于这些特性,人们常常将古典民主理论所构建的这种小共同体民主作为一种纯粹的、完善的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生活的终极理想。卢梭所构造的民主共同

体,马克思所描绘的巴黎公社就有着这种民主理论的影子。但是,古典民主理论既充满了魅力,也缺乏生命力,几乎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中。在现代社会中,民主重新获得了其统治的合法性,但这种合法性却来自于对古典民主理论的否定与批判。

二、进入现代的西方民主理论

现代民主生长于市场经济的母体中,以资本主义生产及生活方式作为载体,以现代民族国家作为活动场地,因而,以现代民主为关照对象的民主理论自然表现出同古典民主理论迥然不同的风格。现代民主独特的生长、生存及运作方式决定了现代民主理论独有的和古典民主理论相异的特性。

(一)作为一种生活衍生品的民主

在以市场经济为基本社会经济体制的现代社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自然以经济活动为中心,政治生活退居到边缘位置。与社会现实相对应,在现代思想家的思想虚构中,人们原初的生活动机是追求生命、财产与自由,这甚至被堂而皇之地载入到一个国家的宪法前言中^②。在他们看来,和作为自然之物而存在的市民社会相比,政治只是一种人造之物。同样,作为政治范畴的民主也自然而然地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成为日常生活的衍生物。甚至,如果“在共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力”的民主还要盘桓在市民社会中,将会威胁到人们的自由^{③[6]}(第 33 页)。这样,在现代民主理论中,民主就从人类生活中的一种中心事务压缩为一种边缘事务,从古典时代的生活必需品转变为现时代的生活衍生品。由于民主的退却,人们的全部生活也就实现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离。

(二)以物质利益诉求为目标的民主

作为生活衍生品的民主不再具有崇高的目标。它不再是践行伟大德行的工具,也不再是获得自我实现的手段。它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赤裸裸地追求物质利益。在现代社会中,既然政治活动要从属于经济目标,自然,民主也要服务于经济目标,成为人们谋求物质利益的手段。在市场经济中,民主的神圣光环消失殆尽。民主在古典理论中具有积极进取、外向扩张的色彩,在现代民主理论中被狭隘内敛、消极保守的特色所取代。这样,民主就丧失了曾经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崇高地位,一种曾经高尚的生活也就被贬低为低俗的生活。拉斯韦尔认为,政治意味着“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那么,在现代民主理论中,民主就成为实现“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这样一种活动的最佳方式。

(三)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民主

现代人的生活状态决定了他是一个个体的人,一个无根的人,一个个人主义者。他丧失了一切先赋性的外联,他的一切活动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政治成为维持个体自给性的重要工具。相应地,在现代民主理论中,民主不再承担起实现共同体的伟大目标的任务,不再成为实现公共利益的工具;民主成为个体之间的一种博弈工具,目标是实现个体的利益。这种个人利益,自由主义以一个非常动听的术语来表示,那就是权利。这样,作为古典民主理论之基础的公共利益被现代民主理论中的个人利益所取代。

(四)以理性为动力的民主

现代思想家认为,民主的价值体现在它对个人利益的维护。但同时他们也认为,个人利益的追求不但不会危及公共利益,相反还会促进公共利益。而这种效果的形成,正是由于人的理性作用。在他们看来,理性为现代民主的不息存在提供了动力,保证了民主的正确运行,保证了民主的有益性。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理性为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现代民主提供了合法性。现代思想家不相信道德说教,一方面道德说教抵挡不了人们的私人动机,另一方面它往往沦为推行蒙昧政治和高压政治的手段。他们相信理性的算计,相信理性而不是品德才是民主运作的动力。由于他们相信普世的理性,怀疑特殊的道德观,所以他们坚守政治中立论和道德相对论。他们相信“民主的永动机”理论,认为只要对民主体制加以精心的理性设计并投入运行,它就可以永远无误地运作下去,而不需要外在的或附加的道德、宗教和人性因素。

(五)以间接参与为模式的民主

现代思想家认为,公民对于政治生活直接而大规模的参与会危及到私生活领域,导致民主的越界。可巧的是,现代思想家信仰理性。他们相信,通过理性的安排与设计,可以采用以间接参与、他人代理为特征的民主模式,而不丧失民主的真谛。但是,假使从古人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发明,一个人的意志需要由他人来代理,他人拥有优先于自己的地位,这种实践本身就是对民主的否认。这样,由于特定的社会政治条件和特定的思想信仰,现代政治思想家宣扬一种民主模式,叫做间接民主或代议民主,和古典民主理论中的直接民主模式形成了鲜明强烈的反差。

(六)以多元主义为特征的民主

现代社会的基础是个体,所谓原子化的个人。这样,个人主义就成为现代民主理论的基础理念和方法论前提。个人主义承认个体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承认各种事物与观念生存的合理性。观念认知上的多元主义必然导致体制设计上的多元主义。现代思想家承认个体的差异,承认不平等的事实,所以接受政治精英的存在。现代思想家既接受个体实质上的不平等,也认为在理性作用下,冲突本质上有趋向和谐的特性,那么,作为这种不平等的补救措施,个人联合起来的相互对立的阶级、政党和集团可以作为参与民主政治、维护个人权利的主体,而不会导致社会冲突。这样,现代民主理论承认精英、阶级、党派合法性的多元主义和古典民主理论反对精英、宗派的平民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现代民主理论为了在特定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条件下实践民主,对古典民主理论进行了一番改造。这种改造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评价:一方面,它使民主实践在中断了一千多年后重新焕发了生机,不仅使民主一词重新获得了积极的认可,而且使民主重新成为人们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目标;另一方面,这种改造同时也意味着民主的“民主性”的削弱,甚至意味着对民主的阉割。它将民主只限定在政治领域,它将民主庸俗化,它接受“不平等”的民主。总之,它以牺牲民主的理想来使民主获得生存。这种有缺陷的民主理论需要在新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条件下进一步地完善,时代的发展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机会。

三、古典特征在当代西方民主理论中的复兴

当代西方社会的经济、社会及文化条件相对于现代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变迁。首先,经济发展使得人们普遍不再为物质匮乏而担忧,不再把物质利益的追求作为生活的中心事务;其次,职业结构的变迁壮大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新的阶级主体,旧的阶级与等级界限正在消弭,或出现了阶级收平化的趋势;再次,大众传媒的发达可以广泛地传播新的价值观,人们不再因循陈旧的意识形态观念,思想视野更加开放;再次,教育的普及与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人们对政治事务更感兴趣,对政治的认识可以摆脱父辈的成见;复次,自由主义式的个人主义受到批判,人们开始呼吁政治的伦理化和共同体化;最后,公众的价值观正在从物质主义转向后物质主义,从对物质福利与肉体安全的强调转向对生活品质的强调,转向对精神归属、自我表达与自我实现的重视^[7](第21页)。

英格尔哈特指出:“西方人口中前所未有的大部分人是在非常安全的经济条件下养育而成的,经济与物质安全继续得到积极的重视,但它们的相对优先性却比过去降低了。”^[8](第64页)他把这种社会称为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在这种社会变迁的背景下,西方民主理论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崭新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还处在萌芽之中,尽管其划时代意义还没有被人们普遍认识到。

(一)民主的生活化

在民主退却到政治领域后,当代学者们又要求它重返日常生活领域。主要由同性恋运动、少数族裔运动和女权运动所表现出的对个人私生活方式的选择与诉求成为政治表达与参与的目标之一;民主政治决策深深地涉入到经济、医疗、教育、居住等传统上政治不干涉的日常生活领域;以普通公民为主体的社区民主、地方自治成为公民与国家的重要政治议程。在这种新的政治形势下,当代学者们要求民主突破现代政治中传统的公私界限,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主流的政治两分法

观念^④不再被人们所珍视,学者开始反思自由主义的非政治化对民主政治带来的危害。

(二)民主的非物质化

在长期和平与物质丰裕的社会中,形成了新的民主参与观:公民参与政治不只是为了物质利益的满足、生活水平的提高,参与政治也成为获得他人的认同、实现某种道德理想、维护特定生活方式、改良生活品质的机会。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当代民主理论研究者认为,政治参与开始摆脱狭隘的经济利益的支配,自我表达与自我实现进入政治活动领域;民主政策的目标也不再囿于经济保障问题,开始向文化发展、政治认同等目标延伸。我们将这种新的民主观念的出现称之为政治的理想化。同现时代的政治的庸俗化相比,它是一种相反的过程。

(三)民主的公益化

在当代社会中,个人、社会之间联系的强化,人们生活视野的扩大,以及人类生活环境的变化使人们认识到,个人私利并非和公共利益一直和谐,公共利益重于个人利益,人类利益重于国家利益。强调权利优先于善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受到普遍的质疑,强调公共利益与共同体价值的社群主义、共和主义和法团主义等意识形态异军突起。

(四)民主的道德化

20 世纪的政治经历,以及后现代思潮的反思,使得人们对理性一心一意的信仰受到普遍的怀疑;政治领域中多元主义的肆虐所导致的公共决策私利化、集团化使人们呼吁公共道德的回归。“追寻美德”成为西方民主政治研究中的强大呼声;甚至有学者提出,为了解决现代性危机,我们必须重新“回到亚里士多德”那里^[9](第 249 页)。在学术研究中,公民资格与公民教育成为学者的热点话题,打破了自由主义者历来对于道德问题“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10](第 509-582 页)。在当代学者的眼中,道德重新成为民主政治的驱动力量,尽管不是唯一的,因为他们并没有完全抛弃对自由主义制度论的信仰。

(五)民主的直接化

普选制的真正实施,新闻舆论的无孔不入,利益集团的蓬勃发展,地方政治的日益回归,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以及全民公决的广泛推行,使得当代西方民主理论中出现了以对直接民主为特征的参与民主、协商民主及社区民主的倡导。它意味着普通公民可以更容易、更直接地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这种新的民主模式在实际政治实践中的萌芽并没有验证近代学者对于直接民主所带来的“暴民政治”的担忧,相反却激发了西方民主政治新的生命力。

(六)民主的平等化

在当代西方民主政治生活中,由于公民政治效能感的提高,阶级对立的趋缓,政党整合功能的衰败,以及官僚制的刻板无能,平等主义或平民主义的政治诉求更加明显。当代学者们希望建立不再以传统的阶级划分为阵地的新型政治整合,对等级化的官僚制与政党体制进行猛烈的攻击,要求将平等的民主权利扩展到整个人类乃至整个自然界。

当代西方社会和现代西方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现代西方社会相比,它是否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如一些学者所言,尚属疑问,它的一些新的属性尚在萌发中、变化中。与此相对应,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的一些崭新特性也处在不定型之中,还远远没有借此而形成一种系统性的完全不同于现代民主理论、属于一个新时代的理论体系。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当代民主理论中的上述新趋势和现代民主理论的特性相比,具有一定的断裂性:现代民主理论以非生活化为旨趣,以物质利益的实现为目标,以个人私利为基础,以代议民主为模式,以多元主义为特征;当代民主理论则试图实现民主的生活化,摒弃民主的物质利益化,获得民主的公益化,以直接民主修正代议民主,容纳更多的平等主义。现代民主政治理论曾经在其母体——封建社会中孕育、发展了几百年,而在当今的一些后发国家中,它依然是一种崭新的观念。同样,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遥远的未来社会中有可能成长出一种崭新形态的民主理论。

如果我们以历史的眼光考察民主理论发展的几个阶段,我们就会发现,当代民主理论竟然和古典民

主理论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两者都认为:民主不是遥不可及之物,它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参与民主不只是为了获得猥琐的物质利益,还是为了获得人格的完善和自我的实现;民主政治除了可以维护个人权利外,还具有超脱个人私利的更高尚的公共目标;民主可以是对道德目标的追求,而非只是对物质欲望和基本生存的满足;民主意味着公民的直接行动,而非被动无力;民主虽然不排斥精英人物,但平等的民主更有价值。

如果我们能够深刻地认识到当代西方民主理论中的这种新趋势,并且将它放在西方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的话,我们会发现,这种新趋势意义重大,它可能会导致一个新的政治时代的出现,一种新的政治生存方式的肇始。古典民主理论的某些观念在当代政治生活的复归意味着政治又重新成为人类生活中的伟大事物,成为人们摆脱俗世羁绊获得精神超脱的新大陆,成为完善人格、获得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的新圣经。这,或许意味着“政治终结论”的终结。

注 释:

- ① 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他反复声明,凡是抛弃政治生活者,不是“一只野兽”,就是“一位神祇”。
- ② 《独立宣言》声称,每个人都生而拥有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快乐的权利,政治就是为了实现这种权利。
- ③ 贡斯当在《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演说中,严厉地谴责了民主的越界给现代人的自由所带来的威胁,他所谓的现代人的自由,实质就是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私生活自由。在演说的结尾,他也有保留地承认了民主的工具价值。
- ④ 这种两分法比较著名的例子有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即民主与自由)、市民社会与国家、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等。

[参 考 文 献]

-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版。
- [2]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版。
- [3] [法]卢梭:《爱弥儿》,李平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版。
- [4]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版。
- [5]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版。
- [6] [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版。
- [7] [美]特里·N·克拉克:《新政治文化》,何道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版。
- [8] Inglehart, Ronald. 2003. “Changing Value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in Goodwin, Jeff & James M. Jasper (eds.). *The Social Movements Reader: Cases and Concepts*. Malden, USA: Blackwell Publishing.
- [9] [美]麦金泰尔:《德性之后》,龚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版。
- [10] [加]威尔·金里卡:《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刘莘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版。

(责任编辑 叶娟丽)

Thinking of the Trend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Democracy Theory

Hu Yong

(School of Politics &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 The new trend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democracy theory must be evaluated in the whole history of Western democracy theory. This new trend has a little discrepancy with the modern democracy theory, but has a bit correlation with the classical democracy theory.

Key words: classical democracy theory; modern democracy theory; contemporary democracy theory